

文章编号:1674-8107(2017)02-0061-06

# 时空语境与《周易》的符号阐释

苏 智

(浙江音乐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浙江 杭州 310024)

**摘 要:**《周易》符号意义在实际解读中会随着时空语境的变化而产生差异。究其原因,自我作为符号阐释的主体会在语境转换中出现变化,从而影响与周围场域的关系。《周易》中“时”的观念对符号阐释具有重要意义,时间沿着线性一维度不断延续,符号意义也就尤为注重时效性,强调因时而动,相时而变。卦位设定了《周易》符号中各爻位的空间场景,同时也代表文化语境中自我的社会属性。因此,《周易》符号在卦位中“吉”、“凶”、“悔”、“吝”的各种解读也彰显出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

**关键词:**《周易》;符号;语境;时间;卦位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7.02.010

符号阐释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语境的影响,尤其像《周易》这种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符号文本,其意义解读更讲求时效和场景状况。符号在每一次解读中皆处于特定的时空中,符号自我在时空中出现位移,自我与存在场域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变化,从而导致符号意义解读的诸多差异。

## 一、线性时间推移中的阐释差异

在《周易》的符号意义阐释中,“时”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周易》的阐释是具有时效性的,任何阐释都不能脱离意义所在的时空场域。易的本质便是在变与不变之间的转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sup>[1](P86)</sup>。一切应时而变,时变则意义关系瞬息万变。《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寓意着天地人之间的某种时空场域,六十四卦则是六十四个时空场。每一卦中的六爻变化无不体现着事物之间的规律以及人在某种时空变化中的种种状态。“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sup>[2](P604)</sup>

首先,在《周易》所列六十四卦的规律中就强调了“时”的重要性,卦义要申明事物之间的规律,

最开始便是要与“时”的分析相结合。欲知其意,先明其时。“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惟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可见矣。”<sup>[3](P89)</sup>

其次,在《周易》的《彖传》中也经常会将“时”直接提出来,诸如“时大矣哉”的说法屡见不鲜。六十卦中在卦辞里提到“时”的卦有《豫》《随》《遯》《始》《旅》《坎》《睽》《蹇》《颐》《大过》《解》《革》十二个卦,有些说法又将其称为“十二叹卦”。其中《豫》《随》《遯》《始》《旅》五卦的卦辞为“时义大矣哉”。这些卦的意义有效性皆来自于所处之时,强调其意义与时间时势等因素的紧密联系,从而加深人们对卦义的理解。以《豫》卦为例,其《彖》辞说:“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sup>[1](P31)</sup>《豫》卦象征欢乐,却时刻劝导人们不要贪图享乐,以免乐极生悲。卦画坤下震上,所以说是“顺以动”。彖辞所赞

收稿日期:2017-03-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13&ZD123)。

作者简介:苏 智(1987-),女,辽宁沈阳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周易》及传统文化的符号学研究。

并非无原则的《豫》乐,而是强调君子要效仿圣人、效仿天地那种自然而顺动平和之乐,做到“上交不谄,下交不读”<sup>[1](P88)</sup>,这样才能“四时不忒”、“刑罚清而民服”。《豫》卦《象》辞赞叹《豫》之时的重要内涵,其意义的理解离不开其“时”的把握。

《坎》《睽》《蹇》三卦皆不是嘉美祥和的意思,普通人在占卜中得到此卦则喻指其所处的艰难境遇。然而,此三卦的意义却可以在圣人那里得到运用,而运用更要结合所在的时势和环境,因势利导,所以卦辞曰“时用大矣哉”。例如《坎》卦《象》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sup>[1](P42)</sup>《坎》卦是大险的卦象,只有圣贤才能扭转危险的局势,转而化不利为有利,借天地间的险峻之势为己所用。王公等有德居位之人,往往可以利用山川之险峻作为其国家的防御工事。险峻是否能化为有利因素要看所处时势,更要强调如何因时而用。又如《睽》的《象》辞:“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sup>[1](P50)</sup>睽本是乖异的意思,小人用之,就会执着于相背之意。意义相背离则不能沟通,所以不能与人共事。而大德之人却可以秉承中正之道,求同而存异,做到和而不同,这样才能“其事同”、“其志通”、“其事类”,《睽》的道理才能彰显。“睽之时用大矣哉”既是强调其意义的掌握要知“时”,更要知用,此非圣贤之人所不能。

《颐》《大过》《解》《革》,皆是大事变革的重要时段,故曰“时用大矣哉”,希望人们可以对所处的时势有明确的认识,从而有所戒惧,谨言慎行。“时运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缓解’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变革’之世是也。故举此四卦之时为叹,余皆可知。”<sup>[1](P31)</sup>《周易正义》中认为,人生在世,或逢治世,或逢乱世,要想安然处于其间,其中有很大的道理。此四卦皆言“时用大矣哉”,乃是不同时势的象征。

再次,《周易》的符号系统象征了一种宇宙的动态运作模式,按照其生生不息的原理,宇宙万物无不在“时间”的长河中发展变迁,因此,《周易》的时间性也体现了其创造性。在《周易》之中,每一卦或一爻的“位”之不同,所遇的时也不同,故而有“时位”的说法。程伊川认为《周易》是因时而取义

的。变易是《周易》的永恒之道,生生之谓易,是阴阳的变化,阴阳不测之谓神。正因为阴阳不测,事物的发展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李靓的《易论》认为:“时有大小之分,有的是将一世作为一时,如否卦、泰卦之类,此乃天下人所处之时,也是大的‘时’;有的是将一个事件作为一时,就如讼卦、师卦这一类,这就是小的‘时’。由于‘时’的类型是不同的,所应对的事情也各不相同,所以占卜的意义也就不能混淆或相互替代。“诸卦之时,君之所遇者多,以事无不统也。臣之所遇者寡,以事有分职也。或一人之身而兼数事,或终食之久而移数时,时既屡迁,迹亦皆变,苟不求其心之所以归而专视其迹,则散漫简策,百纽千结岂中材之所了耶?”<sup>[4](P87)</sup>重要的是,在面对不同的状况时,要以顺应时势的心态去因势利导,把握事物的发展,不能专注于具体的卦象和一时的事例,因为事物的发展不会停止,而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变化。如果只专注于一时一事,就很容易时过境迁,一切皆为陈迹,那么占卜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只有从理性和整体上去考察事物的变化,才能随时做出正确的反应。

因此可以说,时间和意义几乎是共生共灭的,时间改变而意义也不会停滞不前。《比》卦的卦辞说“比:吉。”<sup>[1](P26)</sup>意为亲比而得到吉利。然而卦辞上注明“不宁方来,后夫凶”<sup>[1](P26)</sup>。先后是一对时间概念,之所以“后夫凶”,按照《正义》的解释,因为亲比贵速,若及早而来,人皆亲己故在先者吉。若在后面而至者,人或疏己,亲比不成,故“后夫凶”。由此可见“时”的重要性。在《周易》的占卜中,“时”是有层次的。首先,通过占卜确定所处的总体的时势,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时。然后,再在所处卦时中确定具体的爻时,也就是卦时的某一阶段。在此一例子中,如果占卜得到的是《比》卦,则规定了所行亲比之道的时势。不同的爻时处于《比》的不同阶段上。依据卦义来看,亲比贵速。则处在上六爻所处之时便是卦辞中所言的“后夫”之时,在亲比的总体时势下就显现出了凶险。其爻辞说:“上六:比之无首,凶。”<sup>[1](P26)</sup>他人皆比,自己独在最后,被众人所弃,所以自然会出现困境。相反,《遁》卦初六则曰:“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sup>[1](P48)</sup>《遁》卦所处正是一个逃遁的时势,逃遁就应该尽快远离。初六爻处于内卦最下,是最后逃遁的,因此是

“遁尾”。既然已经是祸到临头,那么再想逃遁已经来不及了,反而有所行动就会被逮个正着。所以还不如老实地躲避起来,不要轻举妄动。故其《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此爻固然教导人们在面临灾祸时要沉着冷静,切勿妄言妄行,但遭遇遁尾之厉的最初原因始终还是没有掌握好时机,逃得太慢了。因此,要把握吉凶祸福,用正确的思想主导行动,首要条件还是对时机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周易》意在阐发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揭示宇宙天地的自然规律出发,从中为人在天地之间的行为创立规则和典范。故《周易》之时,不仅局限于人类社会生活。李靓所说的大小之时皆从人事的角度出发,其实《周易》法象自然天地之造化,其中更是不乏对天时运行的描写。《剥》卦和《复》卦最能说明这一问题,二者是一对相反的卦。《剥》卦卦画是众阴剥一阳,阳气逐渐被剥蚀殆尽。《复》卦卦画相反,是出于阴极阳生之时,一阳始复的过程。这些是从天时的变化而来,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圣人仰观俯察,法于天地。君子朝乾夕惕,法于圣人。天时与人时本来互通,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祸福变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况于人乎!可见,《周易》之时,不仅为小时,更为大时,其道之根本来源于天时。天时变化,客观的现象世界更替,其被感知到的意义自然随之改变,出现了春夏秋冬、生死荣枯的意义分节。人事中的时间变化同样伴随着此在的不同阶段,任何事物也都遵循生、住、坏、空时间线索做出改变。事物的存在是确定在时空之内的,空间可以相对静止,但时间却是一维线性的,不能有片刻的停息。就如古希腊的名言所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即使是同一个空间位置,今日所处之地已经不同于昨日之地,而明日又非今日。有人说,乡愁是时间的而非空间的,因为时间不可倒退,纵然故地重游,昔日的“杨柳依依”也早已化为眼前“雨雪霏霏”的不可言说之无奈悲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意义的分节几乎是界定在时间之上的。

《系辞下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sup>[1](P86)</sup>要知所处之时,适时之变,才会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许多先秦的典籍同样强调了“时间”对于

事物发展变化意义的重要性。《左传》说“相时而动”<sup>[5](P44)</sup>，“姑务修德以待时乎”；《国语·越语下》云：“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sup>[6](P41)</sup>这些都是极富说明性的例子，表明了《周易》时代先人对于时间的看法。无论在客观上采取何种行动，其思考的着眼点从根本上来讲依然是时间推移所带来的意义变化。面对时间更迭导致意义变化的必然性，《周易》提出了“知时”的观点。所谓知时，自然是要认清所处的时势，然而深入分析这种思想，依然可以发现其含义的不同层次。知时的最低层次是不违时。违背时势而行动就是与某一时间所处的意义相悖，这是便是妄动，容易招致灾祸。所以，至少要做到不违时，这样才能基本保证处于“无咎”的状态。其次，如果能做到“及时”，那便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吉”的因素，提高处事的成功率。《乾》卦《文言》九四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sup>[1](P16)</sup>若不能“及时”，便是错失良机。时间的一维性也从根本上导致了意义的不可重复性。再确切的表意也只能无限接近意图定点，完全达到意义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意义的磨损不可消除。通常意义的“知时”是一种“因时”的状态，即把握事物发展的时机，因势利导。要想把握时机，就要朝乾夕惕，时时反省自身，反复其道。“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sup>[1](P16)</sup>而“知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先时”，即走在时间的前面，在细微的征兆中把握意义的变化趋势，从而做出预先的准备，正所谓“知几其神乎”<sup>[1](P88)</sup>。《坤》卦初六爻辞曰：“履霜，坚冰至。”<sup>[1](P18)</sup>这里既反映了自然时序变化的规律，同时是先贤倡导预见先机的睿智。把握事物发展的先机，就可以先于某种现象和意义出现之前做好准备，从而采取正确的行动。占卜的作用就是为预见先机提供一种手段，如果人掌握了这种“先时”的能力，那么大可不必求神问卜，这就是所谓的“善易者不占”。

## 二、卦位空间变化中的阐释差异

符号意义的阐释受到横向时间语境的影响，在共时的关系中，又会随着空间关系的变化而产生差异。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过程都是存在于某种时空关系之中，不存在脱离时空关系的意义。因此，符号在某一时刻被赋予意义，而在其解释的过程中却有可能时过境迁，从而导致传达的意义产

生了差异。同样,空间关系依然是符号表意语境中的重要问题。

《周易》的符号系统讲求空间和时间上的关联,符号与空间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并且,《周易》中的空间关系并非仅仅是客观的方位分别,其中不同空间位置在社会伦理中占有着不同的地位。《说卦传》中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sup>[1](P94)</sup>从这几句概况性的描述中即可发现,《周易》存在着与时间和空间的紧密联系。在这八卦与具体方位关联的解释中已经可以看出,方位与符号的对应背后还存在着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主导。后天八卦出于周代初期,不乏周朝取代殷商的政治背景。乾坤二卦象征天地却不在正北和正南,而是代表西北和西南方向,这恐怕也与当时周国统治区域处于殷商的西边有关系。从简单的八卦方位对应上就可以窥见空间语境对符号系统意义限定的端倪。在《周易》符号的阐释中,与时空紧密相关的因素奠定于其元语言之内,而具体的表意过程中结合语境时空的变化便会造成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状况。

《周易》的符号系统对空间关系集中表达最典型的还是出现在卦画符号的六爻排列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sup>[1](P75-76)</sup>这是说明《周易》之不易的道理,即天地上下等级尊卑,阳贵阴贱的高低是亘古不变的。将其赋予“位”的意义中,可见《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中具有六爻,六个爻位的高低位势表意是相对固定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sup>[1](P90)</sup>六位中的初位和二位为地,三位和四位为人,五位和上位为天,这是用六位的位势来譬喻人世的三才之道。六位中又分阴阳,其中初、三、五位是阳位,二、四、上位是阴位。若以贵贱论之,则初位为庶民,二位

为士人,三位为大夫,四位为公,五位为天子,上位为宗庙。后世《易纬·乾凿度》以及《京氏易传》等均依此立论。在这个上下分别的模式中确立了“位”的空间表意的相对稳定性。六位界限分明,并以内卦外卦两两上下组合的形式构成六十四卦。其中,上卦中的中爻与下卦中的中爻,即爻位中的二位与五位在六位空间分布中处于中间的位置,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位”的概念在表意中具有着相对稳定的空间性。而且,必须要强调一点,《周易》爻位对应的空间关系虽源于客观存在的方位位置,但在文本符号内部的阐释中已经在此基础上作了抽象的处理,转而隐喻社会生活中的权位贵贱与社会等级,这就和人的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

符号阐释的主体是人,在《周易》的占卜中也作为占卜的对象主体。人是由不同层面的自我组成,占卜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要明确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在纵向上,符号自我存在上下的位移,上到社会的、精神的、责任的、道德的,下到本能的以及“自由”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提出,社会中的个人可以分成六个层次:一个“心理的”个人,向上成为“(人际)互动的”、“组织的”甚至“社会的”自我,向下可以成为“有机生物的”,最后成为“机械的”自我。<sup>[7](P355-356)</sup>这个纵向划分在共时事物基础上规定出了上下两级,同样支持精神和物质对立的二元观念。引入符号自我纵向关系的讨论会发现,其与《周易》六爻中位次上的空间变化具有互通关系。空间位置的变化是阐释主体语境的变化,影响着符号意义的解读,转而意义又对符号自我的建构产生影响,从而更新着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在《周易》中,人与外界之间的纵向关系往往在卦位的排布中得以体现,而卦位的排列呈现出了上下空间的位次关系。这并非仅仅是就事物客体的空间位置而言,也包含了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等级状态。

首先,在《周易》的卦画符号阐释中,根据位的高低不同,即使在相对一致的时空场域里也会出现不同的吉凶状况。依然以《豫》卦为例,除九四一爻为阳爻,其余皆属阴爻。在众多的阴爻与九四之阳爻相感应而“豫”。初六和六三两个阴爻以阴居阳位,所以不正。以此结交九四阳爻,就所谓“上交有谄”。六五同样以阴居于阳位,是为不正,阴柔不

足以统领阳刚,所以不能与九四的阳爻相争。以阴柔乘阳刚,其处境依然岌岌可危,只是由于所处在在上卦中位上,地位尊贵,故而能保“恒不死”而已。上六爻居处在极位,过于纵乐,如果不能有所戒惧,加以改变,其结果也不言而喻了。只有六二这一爻是以柔居阴位,居中得正,所以能做到“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故而没有凶险的结果。又如《解》卦,其六三爻说:“负且乘,至寇至,贞吝。”<sup>[1](P168)</sup>六三是阴爻处于阳爻的位置,这是不当位的,所以不正。爻辞中运用了一个身份尴尬的比喻:“负”是小人做的事,而“乘”却是大人的出行方式,也就是小人僭越了身份,做了大人的事情而其自身的身份本质却仍没有改变,这样就酿成了祸端。这样不合法度的情景自然引起了盗匪的注意,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是对卦画符号关系的比喻,但“位”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隐喻却表现得很明显。可见,“位”的等级高低直接导致了主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差异,从而对符号的阐释和吉凶的预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即使是在同一个占卜判断中,主体地位的不同也会为吉凶判断带来不同的结果。《师》卦卦画为坤上坎下,其六五爻的爻辞为:“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sup>[1](P57)</sup>六五爻是阴爻处于中位,但是出师打仗要刚健才可驾驭,所以六五的阴爻不足以帅师,必须委任他人。五位与二位相应,九二爻又是阳爻,具有刚健之德,正好委任,相当于长子。六三爻为阴爻,为弟子,则不堪重任。故而爻辞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如果是长子,则可以委以重任,可以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若是派弟子出去就必然会遭遇舆尸的惨败。此处面对同一事件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那么,在事物应对上就必要慎重考虑当事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因素,才能做出适当的决策。因此,《周易》符号系统强调“位”对语境和意义的作用,要求充分考虑占卜主体及当事者的身份地位,从而对事物吉凶发展得出正确的预见。

同时,人们在运用占卜指导生活时,却也在这种种的符号意义交流中确定自我的位置和意义。面对占卜到的卦象和卦辞解释,主体要结合自身的身位语境来做出适合自己的判断,从而再一次地确定了自我在纵向上的符号意义。相反,在无法确认自己所处位置和阶段的时候,却可以从占卜

显示出来的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联中重新对自我的身份和符号意义进行界定,从而增进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如《旅》卦,讲的是羁旅之中的世事变化。初六爻:“旅琐琐,斯其所取灾。”<sup>[1](P68)</sup>因此爻处于卦体最下处,在羁旅的过程中必为卑贱之役,不得所安,故有此灾祸,意志困顿。而上九爻:“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sup>[1](P36)</sup>,此爻就刚好相反,处于卦体的最上处,是将自己所居的位置放在了高危之处,如同鸟的巢穴。羁旅的身份造成自身与旁人的疏远,却处于最高的位置上,这是非常危险的。高位必被他人侵夺,犹如鸟被人焚毁了巢穴。事物判断的结果皆与所处的卦爻位次息息相关,人们从占卜的结果与实践中可以反观自身所处的地位,从反复的印证中有所感悟,进而重新认识自我,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计划。这也是符号意义的循环阐释和试推的过程,自我在试推中不断校正原有的意义,并再度建立起符号自我的价值,这也说明了意义阐释中“我错故我在”的道理。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同样会发现,《周易》中“位”的空间语境及其社会伦理意义必须结合“时”的关系来看。“位”是兼具时间、空间双重向度的模型,随着“时”的变化,“位”可能在主体的发展中出现变化,而“位”一旦出现变化却是一定处于时序的流变中。在不同的“时”中,即使是相同的位,它所表示的意义会具有很大的差异。以《艮》卦为例,其《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sup>[1](P62)</sup>强调物的止息,各有不同的时运。从“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到“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sup>[1](P62)</sup>,是自下而上变换止息的部位,每一个部位的止息过程皆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随着时间推移,施行禁止的部位也随着卦爻的位次作出改变。因此,六位的空间排列本身即是存在于一个流动的时序变化中,故而无法脱离“时”而谈“位”的意义。不同的“位”在空间上的相互指涉,只是机械地反映出客观世界中的一种现存等级差异,但在世事动态的转换平衡中,“位”的转换也只有通过“时”的转变才可以达成。“位”不仅体现了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是符号自我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对话。王弼《明卦适变通爻》曰:“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卦者,统一时之大义;爻者,适时中之通变。”<sup>[2](P604)</sup>应该说,“位”是“时”中之“位”,“时”是其存在的本质元素,

是位势转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阐释其“位”之吉凶的主导参照物。就如在《周易》中,六位中的中位(即二位与五位)往往是吉位,但是在不同的“时”下,其吉凶也不尽然。《节》卦的二位“九二,不出门庭,凶”<sup>[1](P70)</sup>,即是因为处于“节”的时势下,以制度节事为宜之故。二位本处中正,应该宣扬其制度,此处却“不出门庭”,因而错失时机,使节道荒废,故而凶莫甚焉。《周易》的“趋时说”也反映出“时”“位”相依的特点。“时”与“位”共生而存在,得位之吉可能因失时而变为凶险,而失位之凶却常常因得时而化解。由此可见,“位”在阐释中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向度的模型,其表意最终要在“时”的导向下才能得出适当的解释。符

号自我也是通过语境中“时”和“位”在横向与纵向双重维度上对符号的阐释得出意义,进而反观来得出的。

综上所述,《周易》符号阐释离不开相关的语境,尤其是时间和空间等最基本的语境。此时之自我并非彼时之自我,此处之自我并非彼处之自我,一切相关的意义和联系都处于动态的交互与变化之中。对事物的看法常常会因语境的不同而改变,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也就出现转换,从而获得新的意义。因此,符号自我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使《周易》符号阐释出吉凶祸福各种状况,同时也彰显出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规约。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A].十三经注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 苏渊雷.易学会通[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 [4] 李靓.易论[A].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42册[Z].成都:巴蜀书社,1991.
- [5] 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6] 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7]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On Spatio-temporal Context and the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U Zhi

(Public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Zhejiang Music Academy, Hangzhou 310024, China)

**Abstract:** The symbolic meaning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can make differences in their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change of spatio-temporal context. The reason lies in the change of the subject of self as a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in transformation of context, which produces effect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urrounding fields. 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Book of Changes carries much sense to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As time continues along the linear dimension, symbolic meanings lay particular stress on time efficiency, emphasizing move from time to time and phase change. Hexagrams set space scenes of each Yao position of the symbol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present social attribute of self in cultural context. Therefore,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ll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ymbols 吉, 凶, 悔 and 吝 in their hexagrams manifest their ethic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symbol; context; time; hexagram

(责任编辑:韩 曦)